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 孤军：

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

(美) 柯娇燕 著

陈兆肆 译

董建中 校



人民出版社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

# 孤军：

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

---

(美) 柯娇燕 著  
陈兆肆 译  
董建中 校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赵圣涛

版式设计:肖 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美)柯娇燕 著;陈兆肆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书名原文: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ISBN 978-7-01-015896-9

I. ①孤… II. ①柯…②陈…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IV. 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1700 号

### 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

GUJUN MANREN YIJIA SANDAI YU QINGDIGUO DE ZHONGJIE

(美)柯娇燕 著 陈兆肆 译 董建中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31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15896-9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致 谢

在时下的清史研究中,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对于理解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政治风格、社会环境以及文化活力,其间的东北传统(the Northeastern heritage)显得至关重要。然而,这与我在耶鲁开始研究生学业时的情况截然不同。那时人们普遍漠视满人的文化或语言问题,认为它在征服中国之后鲜有重要性,即便对于之前的时期也不予重视。有关讨论——如果我可以称其为“讨论”的话,充斥着“汉化”(sinicization)这样的认识,其含糊不清令人失望;同时带有汉族本位主义的学术偏见和臆断。那些提醒我注意在“清代汉化”这种惯行研究模式下所存在的“事实缺漏”、“逻辑谬误”、“史实上的种种不可能”的人,我要首先致以感谢,他们是: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弗莱彻(Joseph Francis Fletcher, Jr.)以及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一如本书的读者将会注意到的是,我也深知反对将“汉化”作为分析中国历史的工具,其本身并不能消除清代满人在中国经历的复杂性,因为诸如“中国确曾有过一个‘传统的’满洲文化”,抑或“在中国的满人确曾生活在此种文化之中”的观点,可能也会被人质疑。确实,我的看法或许只会成为新的众矢之的。个中实相远比所谓的中国“现代性”(modernity)转向要微妙难解和富于启发。上述学者还提醒我,须对涉及解构有关清朝历史“现代性”的某些解释的复杂性,保持清醒的认识,对此我要再致谢意。

不应将本书视作我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本,但是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所获得的一些想法和资料,对本书的完成确实裨益良多。余英时、黄伯飞、弗莱德·多纳(Fred McGraw Donner)、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以及李明珠(Lillian M. Li)等人皆以不同的方式,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同样,我也受益于康

乐(Kang Le)、约翰·L.威瑟斯二世(John L. Withers II)、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豪夫(Kandice Hauf)、汤普森(Roger Thompson)、康浩(Paul Clark)、黄进兴、佐伊·勃纳尔(Joey Bonner)、龙塞宾(Leon Seraphim)以及茱蒂思·志贝克(Judith Whitbeck)等人的帮助。对那些后来给我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指导我深入阅读并持久予以鼓励之人,如史景迁、白彬菊、路康乐、韩书瑞(Susan Naquin)、李明珠、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欧立德(Mark C. Elliott)、白瑞德(Susan Blader)以及魏爱莲(Ellen Widmer)等,我要深致谢忱。当我在台湾研究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馆的蒋复璁博士、庄吉发博士、陈芳美博士以及“中研院”的李学智教授等人也提供了帮助,对此表示感谢。尤须致谢的是台北前任满族协会主席广树诚。在中国大陆,若没有清史研究所师生的介绍帮忙及彼此交游,我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此要特别感谢戴逸教授、罗明教授以及张宽先生。感谢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刘宗英为我所做的一切,有她的帮助,我才没有形影相吊之感。尤为感谢清史研究所的李鸿彬教授和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阎崇年教授。最后还要格外感谢路康乐、全大伟(David Strand)、欧立德以及白瑞德等人。多年来,他们慷慨与我分享其在研成果,使我获益良多。

本研究付印成书,自有一种“轻松”的书写风格,若没有罗威廉(William T. Rowe)、罗友枝(Evelyn Rawski)以及卫思韩(John E. Wills, Jr.)等人至关重要的评鉴,本不会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本书是他们激励的产物。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玛格丽特·凯斯(Margaret Case)是本书的编辑,帮我修改书稿,呈现今貌。最后要感谢邱文婷对我书稿的校订,以及在研究上提供协助的乔纳森·泰勒(Jonathan Tyler)。

我在竭力获取由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所拍摄的广州旗民照片的过程中,英国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克拉克·沃斯维克(Clark Worswick)、白思迪(Steven White)、亚洲协会(the Asia Society)、苏富比(Sotheby's)、比尔·麦克昆因(Bill McCune)、格雷格·飞翰(Greg Finnegan)以及吉恩·加斯韦特(Gene Garthwaite)伸出援手,对此亦表感谢。

在我嘉惠甚多的机构中,首先要感谢的是,拥有优良的研究设施和友善的研究氛围的耶鲁大学;其次要感谢康奈尔大学有关机构的支持,其间彭佩尔

(T.J.P.Pempel)、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查尔斯·皮德森(Charles Petersen)、弗雷(Bernard Faure)以及柯志文(James Cole)等人提供了帮助。手写稿是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的玛丽·英格拉哈姆研究所(Mary Ingraham Bunting Institute)完成的,在此伊丽莎白·麦肯锡(Elizabeth McKinsey)、安妮·布克曼(Anne Bookman)、伍慧明、利基·杜克奈特(Rikki Ducornet)、温迪·柯米那(Wendy Kaminer)、艾伦·珀林(Ellen Perrin)以及其他许多人给我以鼓励,以友相待并提供帮助,特此致谢。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尤其是历史系,准予我休假,甚或资助一些研究经费,并提供优良的思考和写作环境。凡此种种,要格外感谢玛丽莎·纳瓦罗(Marysa Navarro)主任以及肯尼思·休梅克(Kenneth E. Shewmaker)主席。尤需感激里德会堂(Reed Hall)里的那些博学洽闻之人,他们是:杰里米·罗杰斯·丹尼尔(Jere Rogers Daniell II)、吉恩·加斯韦特(Gene Ralph Garthwaite)、南希·格兰特(Nancy Grant)、保罗·戴维德(Paul David Lagomarsino)以及查尔斯·塔特尔·伍德(Charles Tuttle Wood);最后提及但洵非无足轻重的是,我在与韦伯斯特(Webster)、盖尔·维尔那扎(Gail Vernazza)交谈中,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在我反复思考、反复研究直至这本书付梓的过程中,我时能受到下列机构的慷慨资助,它们是:耶鲁大学、耶鲁国际和区域研究协会东亚研究分会(Yale Council for East Asian Studies of the Councilium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国防外语奖励计划(the 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s Fellowship Program)、芮沃寿奖(the Arthur F. Wright Memorial Fellowship)、翟尔斯·怀丁夫人基金会(the Mrs. Giles Whiting Foundation)、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安德鲁基金会(Andrew D. Mellon Foundation)、王安汉学研究奖(the Wang Fellowships in Chinese Studies)、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目 录

致 谢	1
导 言	1

## 第 一 部

第一章 和平与危机	13
第二章 苏完瓜尔佳氏	35
第三章 杭州驻防八旗	56

## 第 二 部

第四章 观成	89
第五章 凤瑞	137
第六章 金梁	185
结 论	241
参考文献	255
索 引	264
译后记	280

## 导 言

金梁和文梁,这两个满人小孩,成长于19世纪80年代破落的杭州旗营,已然将宋代忠烈岳飞视作他们童年时代的英雄。待我们察及此点,有关清代中国“旗人”生活的一系列新的看法,将会接踵而至。1142年,岳飞因抗旨反对将华北割让给金朝女真人,而被南宋朝廷诏令处死。岳飞曾经是中国爱国主义的典范,于今亦然。金梁和文梁是满人刻书家凤瑞(曾与太平军作战过的一名老兵)的幼子,他们都深知自己的女真先人乃岳飞的宿敌。在他们所生活的杭州城,害死岳飞的秦桧夫妇被人们制成铁跪像。黎民百姓对之吐唾沫、便溺,以此表达对岳飞的景仰。岳飞在这两个满人小孩的世界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在他们的家乡——西湖之畔的杭州,岳飞被奉为英雄和神祇,亦被视作一名伟大的战士,一如金梁的先祖一样。特别是金梁,人们认为他受到了这位已故将领魂灵的影响。据金梁家传说,在他1878年呱呱落地的那个夜晚,一种令人敬畏的声响,从岳飞墓冢沿西湖向北,呼啸而至八旗驻防营地的金梁家中。

金梁童年时,坚信自己是岳飞的转世,但这并非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岳飞身后备极尊荣,但却以生前无望而孤独的奋战为代价;他的孤独与其高洁密不可分,他在文学上的形象可用“孤”字曲尽其意,这一“孤”字宿命般地与他紧密相连。在他那个时代,意为“孤儿”、“孤独”、“无助”的“孤”字,是对岳飞所带领的宋朝军队于文学意义上的指称。然而,正是他率领的这支“孤军”,在宋朝残余力量撤至长江以南后,在并无支持和补给的情况下,仍行继续奋战着。“孤军不可久留”,成为南宋朝廷中岳飞政敌的口头禅;岳飞遭到南宋朝廷的疏远,他本人之死及其军队的覆灭无可避免。综观有清一代及20世纪,



“孤军”是个常见词汇,用以形容在战斗中没有掩护或缺乏充足补给的情况下,仍然顽强抵抗的军队。<sup>①</sup>“孤”字与英文中“forlorn hope”(意为“无望”)一词的语义同符合契。不过,“孤”字所展现出的孤独寂寥的意象,却与西湖文人产生了独特而颇具浪漫色彩的共鸣。“孤山”高耸于西湖风景之中,越发映衬出岳飞顽强不屈的形象,而在关于整个西湖和杭州地区的诗作中,充满了对孤山的描写。自宋泊明,诗人们对“孤”字情有独钟。<sup>②</sup>1644年夏,杭州文人刘宗周全身心地投入保卫杭州、抗击满人的计划之中(最终徒劳无功),他在向南京晚明朝廷的陈情中,自称是“草莽孤臣”。<sup>③</sup>当然,除乡土情感外,战争英雄的浪漫化,甚或与岳飞之间的灵异关系,均驱策着金梁对岳飞的故事着迷。实际上,在金梁出生前的一个半世纪里,清廷便不断地提升对岳飞的膜拜;官府出资建立庙宇,祀奉这位战神,仅西湖附近就建有四座。此外,还不时地对岳飞的后裔加以封赏。18世纪中叶,清廷已决意超越文化上是忠汉还是忠金的狭隘性,而强调忠诚的绝对价值。朝廷希望所有优秀的旗人,对这一帝国旨奉行不渝,当然同时亦要遵从许多与此相抵牾的其他旨令。

金梁一家在满洲旗营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和财富,但随着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该旗营面临着法律特权地位的丧失、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以及被北京清廷的抛弃。然而,在当时,族属身份的此疆彼界尚未完全泯灭。战时的暴力和损失,以及随后为救济孀居和无家可归的旗人所进行的请愿活动,都强化了旗人之间的既有联系,并且在某些方面逼使他们铸造出一种新的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与此同时,昔日驻防旗营中的这支孤军,显然难以维系,甚至连时为幼童的金梁,亦有此认识。那些因世袭或功业而成为精英的人,忙于救济,并对实务中的方方面面,施以改良计划;而地位远为卑微

① 如《钦定八旗通志》,卷5,第61页上(明瑞和孟溪)。

② 姚梅鑫在《西湖寺院题韵沿革考》中所列吴延楨(第128页,“孤塔”)、许浑(第136页,“孤帆”)、郑巢(第194页,“孤鹤”)、潘阆(第195页,查此人诗中未提及“孤”字,但该诗之左处“苏轼”诗中有“孤烟”句——译者注)、严绳孙(第199页,查该人诗作中未言及“孤”字,但此诗之左处“孙雄飞”诗中有“孤笛”句——译者注)、邓林(第207页,“孤撑”)、崔颢(第221页,“孤顶”)、姚镛(第232页,查该人诗作中未提及“孤”字,但此诗之左处“许浑”诗中有“孤舟”句——译者注)、叶向高(第261页,“孤兔”)等人的诗中,都有这样的反映。

③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357页。

者(其间不乏极端贫穷之人),有的转而从事受人鄙夷的城市买卖,或兼做买卖以维持生计,有的则处于永久性的失业状态。无论地位崇高或身份卑微,亦无论终日忙碌或无所事事,19世纪后期的满人都共同具有一系列独特的行为风貌,并共同面临着一些特有的难题。许多满人对曾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威胁过他们生命或财产的汉人邻居们,心怀疑虑。大多数满人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当下的贫穷与其往昔崇高地位的不相称,使得他们成为当时大众娱乐活动冷嘲热讽的对象。在满人中,瘾君子为数甚多。一些满人冀望外国传教士能带给其精神上的慰藉,抑或冀望获得外国资本家的雇用。大多数满人则沉迷在对昔日光辉岁月的怀旧之中。对善于表达且具民族认同的满人精英而言,开始生发出这样的一种意识:纵使满汉之间,法律上的藩篱最终被清除,驻防八旗的城墙最终坍塌,满人认同的外在遗迹消失殆尽,但是无法消解的满汉有别之源仍将存续。如同经历了所在社会的政治现代化的其他传统少数民族一样,中国满人开始有了族裔意识(a sense of ethnicity),而这在金梁的成年时代,是以“满族”(Manchu race)这个新名词来表达的。

对满人而言,这种种族身份意识(sense of racial identity)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实际上,满人的历史尤为典型地阐明,那种认为本质上存在甚或永远存在“种族”的观点,根本不足凭信;对满人而言,真实情况是:受到政治、文化以及心理力量的形塑建构,“种族”特性才开始逐渐浮现出来。<sup>①</sup> 努尔哈赤(1559—1626[1616—1626年在位])<sup>②</sup>的八旗军队在17世纪之初即已形成,而在当时八旗军赖以形成的东北文化圈里,文化只与地理和外在表征相关。已有汉人迁徙到辽东边界,尤其是在明朝,并且这些汉人已然将入乡随俗视为必需。许多东北的土著民(特别是一些满人的先辈——女真人),却沿相反的方向迁到明朝边境的市镇;游走于他们中间的则是一些商人,他们贩卖马匹、人参、松子、皮毛以及其他抢手的东北货。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政权,忽视

---

<sup>①</sup> 我在别的地方,已对这个基本上是被建构起来的“种族”进行过探讨,同时对种族之于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乾隆朝及以后时期)作过论述。参见《〈满洲源流考〉与满洲传统的构建》以及《乾隆朝对汉军八旗的反思》。

<sup>②</sup> 努尔哈赤是爱新觉罗氏族的创建者,是后金的第一位汗,也是第一位清帝皇太极的父亲。参见阎崇年:《努尔哈赤传》,载《清代名人传略》,第594—599页。

已居于城镇的女真人与他们治下部落村庄居民之间谱系上的关联，而将后者一并归入“尼堪”（即后来的汉军）之列。而这些居于明朝所辖的辽东地区的“尼堪”，到底是汉人、女真人，抑或是朝鲜人，常常无从分晓。17世纪初，这些人来到女真营地之中，或出于自愿，或系为女真劫掠者虏获而来。1601年，“八旗”开始形成。此后，那些融入八旗者，被划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种划分是基于他们文化上的亲和程度，与他们各自的祖先关联并不大。

盛世之时，清廷大大改变了有关身份问题的设想。18世纪的皇帝，尤其是乾隆帝弘历（1736—1795年在位），开始强调谱系的重要性，同时鼓励满人保持或恢复对一些知识的了解。在他看来，这些知识对于满人文化的健康发展和良好精神的保持，是必需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世纪的清廷在强调种族应该决定文化的同时，已开始朝着清朝征服早期时那些反清学者们所赞成的哲学主张迈进。尽管乾隆皇帝对种族身份观念的支持，可能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然而有证据表明，他打造满人种族纯粹性和文化一致性的做法，在总体上是失败的。在真正形塑满人身份意识方面，起到更为关键作用的是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在此期间，许多边缘旗人永远地脱离了旗营，那些仍留在旗营之内的人，则被迫做出忠清抑或背叛的抉择。一些欣然以旗人自居的人，在遭受汉本土主义者的威胁乃至毁灭性的打击的同时，实又受到他们所极力鼓吹的种族有别言论的影响。同时，战争经历以及随后的官方遗弃、经济贫困，成为满人种族和文化自觉意识滋生的母体；由此产生的满人的族群意识（ethnic consciousness），在辛亥革命及随后的年岁中，得到了强化。

对满人而言，本书标题中所涉及的“帝国”（world）一词，有着特别的意蕴。这个以满人为本位的“帝国”，在19世纪碎裂瓦解。位于这个“帝国”中心的是“朝廷”。依最通常的看法，“朝廷”包括王朝统系、朝廷礼仪、现世的皇帝、皇室亲族，以及秉承皇帝意旨而管理朝廷的所有人。“朝廷”位于紫禁城，外有皇城，再外则有内城，而内城与外城一并构成了北京这个帝国中心所在。在京师之外的驻防满人中，鲜有人目睹过北京，尽管他们大多心驰神往。许多旗人的亲戚或熟人，曾因各种机缘到过京城，或出于买卖贸易，或由于科考之需；有的因各种缘由，可能被带去过紫禁城里某一个较小的宫殿之中，并被授

予进入宫门的令牌,如因其科考有成或军功卓著,或缘其对忠贞于清室的先人迟到的寻认。当上述这些人回到旗营驻地后,关于京城一派繁华的言论,便在数千人的旗营中快速散播。一般而言,这些旗人与被他们所统治的汉人相比,实乃极少数。除了东北这块祖宗发祥之地以外,北京(是清代早期所有流动的旗人法定登记的地点)是中国满人精神上的故乡。对不同的满人氏族而言,除了朝廷和首都,王朝的历史以及满民众自身的历史,则构成了另一种无形的凝聚力量。作为王朝支持下的身份认同符号以及家族传说的母体——氏族,在19世纪于不同层面上,发挥着对满人身份进行认定和辨析的作用。然而,满人的世界同样也与每个独立而又长期存在的驻防旗营紧密相连。18世纪初期以降,鲜有满人离开过他们出生的驻防旗营。尽管不同旗营之间的情况不尽一致,但总体上旗人会学讲当地方言,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语言,接受当地许多社会价值观,并爱好当地的历史。上述所带来的结果是,那些仍留守在东北(或于清初返回东北)的满人与驻防关内的满人之间有了区别,而定居在北京的满人和驻防在各省的满人之间亦有不同。在上述多元影响因素的张力之下,起到凝聚黏合作用的是朝廷、京师、历史以及氏族。这些影响力量在动态的相互影响中所产生的不均衡状态,决定着满人的文化命运。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他们开始意识到,清朝肇建者所建构并不断得到强化的满人共同体,逐渐变得不再牢固。

满人及其变动不居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上的身份地位,是清代历史中的根本性问题。关于满人,最频繁被议及的一些论题都是与人为设定的满人“汉化”问题有关,尤以关于“旗人的城市化和汉语化进程给清朝军备及其文化特质所带来的影响”等方面的论题居多。关于“汉化”概念在事实上和理论上的困境,留待本书的后面部分再作阐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对于中国内地的满人,也就是除今天东北、新疆、西藏等地之外的中国满人,我们该如何去认知?本书是一项关于帝国晚期阶段满人经历及情感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苏完瓜尔佳氏中三代成员的经历及现存的有关他们的著述为依据而写成。自清甫一入关迄清季最后的几十年里,这三代人一直生活在浙江省杭州和乍浦的驻防旗营中。他们虽非贵族,但亦未经历过清朝许多旗人所遭遇过的经济贫困不堪的状况。他们对于自身经历的认识,可以折射出中

国各地满人生活方面的重大问题,包括:他们所自知的与一些汉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之间所发生的复杂关系;关内满人生活方式大体上的城市化;对19世纪和20世纪日益逼近旗营的暴力威胁素来缺乏防范;拥有共同身份和共同命运的满族意识日益滋长,迥然异于甚至超越了那些清朝满族的肇建者。这些是满人历史结构特征中当然部分,而这部分内容长期以来被一些约定俗成的有关中国满人及其他族群“汉化”的看法所遮蔽。

目前的这本著作不敢妄言在关于八旗史或驻防制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关于这类主题的研究资料十分丰富,且已被一些优秀的制度性研究著述所发掘利用;不过,在既往资料的基础上,再拓展一些更多的资料既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像一些有关晚清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在其所采用的大量资料中,满洲文化及其经验的重要性,尚未能得到很好的反映。关于满人生活,早在18世纪,即存在着少量但弥足珍贵的资料,当时蒙古旗人松筠(1751—1835)可能是在对东北地区年老旗人采访的基础上,写成了《百二老人语录》一书,并于1791年付梓。<sup>①</sup>以下三种关于驻防八旗的文献资料,连同旗人所写的诗歌及回忆录,是典型的官方历史。其中最早的《荆州驻防八旗志》,是在希元的主持下,于1879年编纂完成的。《驻粤八旗志》则于1879—1884年间由长善等人编纂,记录了广州驻防旗营中的八旗生活。最后一本《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由张大昌等人编纂而成,于1893年由浙江书局首次付梓。《满族简史》于1977年在北京出版,这本书的编写组部分利用了上述第二、三本文献;任桂淳在1981年所著《清代(1644—1911)驻防八旗兴衰史:一项关于广州、杭州、荆州八旗驻防的考察》一书,是一本比较行政史研

---

① 来自喀喇沁的松筠,在撰写有关满洲民间文化的著作之前,已在撰写有关区域史著作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最近,纪大椿在《论松筠》一文中,对松筠《百二老人语录》一书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并提供了一些传记方面的背景知识。松筠《百二老人语录》一书,最早的序言时间是1789年,后该书重印时,又另增了两篇序言。在松筠笔下老人的警告之辞中,有关驻防旗人生活状况的,委婉披露者多,而公然揭发者少。这本书自从被松筠的朋友富俊于1809年译为汉文后,开始广为人知。当然,该书作为一种文本和历史资料,尚存在许多问题。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被故浦廉一(Ura Renichi)和伊东隆夫(Itō Takao)译成日文,被崔鹤根(Ch'oe Hakkūn)译成韩文。陆西华(Gertraude Roth Li)向我指出,乔瓦尼·斯达里(Giovanni Stary)曾完整地将该书译成德文。亦可参见神田信夫:《探求〈百二老人语录〉》(1982年松筠完整的满文原版原著重印时,该文被置于序言之中)。

究方面的著述,其广泛采用了上述三种资料。《绥远城驻防志》于1958年出版,而最近关于呼和浩特满人的历史著述,也已出版。<sup>①</sup>本书是以我的博士论文、已发表及未发表的文章为基础而展开的,主要利用资料有:张大昌的《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以及方志材料,而后者涉及浙江的杭州、西湖及平湖县,北京、四川一些县,以及19世纪、20世纪相应时期东北各地;档案资料主要来自北京的第一历史(明清)档案馆,尤其是神机营和赵尔巽的档案资料;对于一些文学作品,只要认定其有价值,本书亦从中汲取补充性的资料,如一些出于旗人之手或有关旗人的小说,包括老舍(舒[舒穆禄氏]庆春)、敦礼臣([富察氏]敦昌)、[费莫氏]文康,以及吴沃尧等人的作品。然而,还存在一些与本书相关的特殊问题必须指出,因为它典型反映出历史学家自我求证这一吊诡现象。《清史稿》(在某种意义上此书是清朝正史的初稿)是本研究的基本史料之一,而本书中的一位主角(即金梁)因参与1927—1928年出版和发行《清史稿》一事声名狼藉。[苏完瓜尔佳氏]观成(约1790—1842)、凤瑞(1824—1906)以及金梁(1878—1962)等人关于驻防旗营生活的著述和出版文献,可上溯到19世纪早期。诚然,我们赖以了解上述这些人的资料,绝大多数出于他们自己之手,这使得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多有不便。

如同所有的传记、个案研究或地方研究(本书综合上述三种研究元素)一样,本书必然会最终遭遇到“其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这一难题。读者无疑在许多点上想知道,本书中的主角在多大程度上与最广大的满人相类似。我自己也想弄清这一问题。我已尽可能做了比较研究。但是应知道,鉴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有关清朝中晚期满人文化生活的知识,“代表性”可谓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如上所述,在这个领域,仍存有一些绝好的文献资料,以待发掘利用,但为数不多。我们对19世纪、20世纪的满人生活状况获致一个总体观感,其所依据者,除了上述这些资料,实则来源于类似本书一样而基于范围广泛的背景性的资料以及常用的间接性资料之上所写成的著述。以此看来,就(目前)对近现代时期满族文人经历的了解方面而言,本书典型地反映出了这

---

<sup>①</sup> 参见佟靖仁所著《呼和浩特满族人简史》及其所点校的《绥远城驻防志》。包瑞车(Richard Bodman)指点我注意这些材料,对此深表感谢。

种局限性。我唯有默认，本书主题具有代表性。这样的局面将会得到改变，或许会很快到来。

不过，还有一个考虑仍萦绕在怀。本书认为（我确信未来的研究终会证实此点）：纵观满人的历史（19世纪时肯定如此），满人绝非能够提炼成一个独特类型的单一同质群体。满人起源多样，他们阶层等秩森严，地理分布广泛，当清王朝经过全盛时期后，满人内部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差距，已变得至为明显。本书认为，在这种多样性之下，存在着“一致性”。满人既具有“统一”意识，又有“和而不同”之感。晚清的满人，或为贫民，或为中产阶层，或为富民，而其对应的利益代表者则被打上激进的革命派、渐进的温和派、极端保守派的标签，他们并未构成一个单一同质的群体。然而，满人群体亦存有前后一致的统一性。满人的传统文化内核以及当时朝廷着手控制的带象征性的满语符号，连同共有的历史，为19世纪和20世纪满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基础。就杭州苏完瓜尔佳氏这一个案而言，它证实了一个与许多其他满人“和而不同”的满洲话语强势阶层，一个“中产阶层”，正在悄然勃兴。这一阶层，即是《满洲简史》作者笔下的旗人中“新的资本家”。相较其他大多数满人，上述满洲话语强势阶层具有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在居地旗营中，牢固地确立了地方精英的地位，并珍视与北京贵族阶层间的一贯联系及其对朝廷的认同（这种认同越来越成问题），他们代表着清朝后期满人社会中的政治活跃阶层。这一阶层对其自身与其他满人社会和旗人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着相当明晰的认知。作为著者，他们也能够提出一些启人深思的观点，不过同时他们也是主观的，具有个性的，有时甚至是极为古怪的。就此而言，关于本书主角在满人中的“代表性”问题，尚未设计好一个最佳答案，其回答方式远未令人满意。

金梁卒于1962年。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金梁因其记录灵异掌故的笔记，而以“瓜圃老人”这一雅号，著称于世。清亡之际，金梁在记录生活风俗的满洲作家群中，还是一个小角色。但19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最初几年，金梁作为最具活力和较富智谋的清朝遗老遗少之一，臭名昭著。这些遗老遗少们在民国初的一二十年中，尝试建立一个政治联盟，以图恢复清帝国，并使末代皇帝溥仪复辟。1924年，当这一政治联盟被驱逐出北京后，这一希望逐渐破灭。行至1931年，他们的“恢复大业”已为日本关东军所攘夺。在金

梁自己看来,其一生之所以以著书立说为真正出路而别无他途,实是受其出生的时间和环境所使然(与岳飞魂灵浸染有关抑或无关)。我们知道,他常常忧愤。其拥有常为人嘲讽的名门出身,是清朝最受人尊敬的望族之后裔,拥有别人所企求的一切才具和殊荣。其所居之地——杭州,又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美丽、最具文化气息的城市之一。然而,最后 30 年的生活,他却贫困潦倒,被人视为不足凭信的满清遗老,在新秩序之下无一席之地,且对眼前的新形势困惑重重。金梁的一生,并非时刻都具备令人推崇的睿智、勇气或风骨。不过,金梁的一生无疑是不寻常的一生,据此我们得以了解到一个历经沧桑之人的历史世界。



